

编者按

陈景润、蒋筑英、南仁东……每个时代都有一群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为攀登科学高峰直至生命“燃尽”。

所谓“大智”，对于他们，就是心无旁骛，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时代呼唤英雄精神，时代呼唤英雄辈出。60年来，《中国科学报》在发现和挖掘闪光细节、书写与传承英雄事迹与精神的道路上，走在前列。



代表性文章

- ◆ 战略科学家蒋新松 (1984年4月11日)
- ◆ 王元院士：陈景润是如何做数学的 (2009年2月3日)
- ◆ 杨振斌：陈景润科学精神丰碑永远屹立 (2013年5月30日)
- ◆ 知识分子的楷模 (2014年1月1日)
- ◆ 天眼“觅源”：探寻宇宙的奥秘 (2016年12月15日)
- ◆ 以身许家国 毕生新药梦 (2018年5月7日)
- ◆ 南仁东去世一周年：给南仁东的五封信 (2018年9月17日)
- ◆ “时代楷模”王逸平：生命书写“药神”传说 (2018年11月21日)

讲好科学故事 我们在路上

■本报见习记者 韩扬眉

1996年1月27日星期六，岁末年初的傍晚，《中国科学报》记者徐建辉在家里接到了报社编辑部的电话，“数学家陈景润院士病情恶化，这个事儿你跟一下。”挂掉电话，她放下手中的活儿，拎着包便赶往了中关村医院。到达时，一场紧张的抢救正在进行，8分钟后，陈景润恢复了心跳。

时隔22年，徐建辉还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

最后时日的“陪伴”

这位著名数学家的病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作为当时国内唯一一家“科”字头媒体的记者，徐建辉亲历并记录了一切。

当晚6时许，在场专家和领导一致认为，要抓住眼下病情平稳的宝贵时机，把病人转移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徐建辉随着救护车一同前往，路上，她从陈景润夫人由昆那里了解到陈景润突发病症的原因：1月中旬，身患帕金森氏综合征的陈景润不慎着凉，引起肺部炎症，连日发烧。27日清晨，他的病情突然恶化，大量痰阻引起呼吸、心跳骤停。

“那天晚上没有几个记者，中科院的领导，数学所所长和杨乐、王元院士等赶到了现场。”徐建辉回忆道，北京市最优秀的医学专家到现场会诊，经过数小时的奋力抢救，陈景润的病情逐渐稳定了下来。

当晚，徐建辉回到家中，在采访本上记录下了抢救现场发生的一切。

大师离去，以文载情

长期的病痛严重消耗了陈景润的体力，当年3月中旬后，他的病情再次恶化。1996年3月19日，数学家陈景润与世长辞。

噩耗传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科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哀悼这位令人尊敬的科学家。徐建辉采访了与陈景润同时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杨乐、王元院士，以及时任中科院数学所数论研究室主任贾超华等。

杨乐说：“以他超人的勤奋和刻苦，将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王元院士转述了国外著名数学家对陈景润的评价：“他对‘1+2’的详细证明在国际数学界引起轰动，被公认为是应用筛法理论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一个光

辉的顶点’。”

贾超华表达了对“科学偶像”的敬佩之情：“陈景润先生的外表和内心形成强烈的对比。从外表看，他内向、文弱，而当你读起他的文章时，就会被文中逻辑的严谨和文思的深刻所折服。”

最后，徐建辉以细腻笔触写下了《此情温暖人间——记陈景润院士的最后时日》一文，当年3月25日于《中国科学报》4版全文刊登，在国内引起了热烈反响。

采访过程中，徐建辉不断被感动着，“那个时代是有诗和远方的时代，科学家们爱国家、有理想、有情怀，陈景润本身不是特别会炫耀的人，非常质朴，根本没有考虑过物质和享受”。

讲好科学故事 未完待续

那是个知识分子还未完摘掉“臭老九”帽子的年代，但同时，又是急需科学家们挺身而出建设中国的时代。

1978年1月，一篇以陈景润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陈景润家喻户晓。屈居6平方米小屋，借一盏昏暗

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6麻袋的草稿纸，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他的事迹感动了全国人民。

这部文学作品有力地推动了一场思想解放大潮，为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年浩劫中，《中国科学报》也未能免于停刊的灾难。1979年11月2日，《中国科学报》正式复刊，是当时仅有的几家行业报之一。我们幸运地赶上了“科学的春天”的早班车，见证了科学界复苏并渐入正轨的历史。

那时还没有电脑，记者们一字一句手写着最新的科学成果和科学家的故事，挥毫落笔的瞬间，彰显的也是科学记者的力量。

在徐建辉看来，如今，在这个科技发展的最好时代，年轻的科技工作者追随着老科学家的足迹和精神，为强国建设奉献自己。对于科学记者来说，这是个科学传播的最好时代，有无数科学新闻“富矿”等待挖掘，有更多感人平实的科学故事等待讲述。

专家点评

培养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学家

■席南华(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个惊世的数学成就，背后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和一种顽强的拼搏精神。随着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及其科学成就传遍了祖国大地。

在那个科学与科学家均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年代，陈景润先生艰难地在科学的路上攀登，为后人留下了珍贵

的遗产。他的成就至今受业内敬重，不会被遗忘，且注定会有其历史位置。

他的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之中，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对后辈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对于每一个已经来到或是即将来到中科院教学院工作的科研人员来说，到陈景润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学习工作、看到他的名字，这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内心自然也会产生自豪感。

陈景润的精神伴随着我们，告诉我们，珍惜今天的时光，清楚自己的职责，忘却前进路上的各种干扰，做好本职工作。

如今，我国已做出了很多国际一流、有影响力的数学成果，获得国际同行的

高度评价。但我们与国外仍有差距，这个差距在于中国缺乏特别有影响力的数学家。

要成为一位领袖型的科学家，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力，除了学问以外，还要有非常深厚的学术思想，有深刻的见解，能够影响一批人。我们需要培养这样的人才，但这是不太容易的。

再忆“光学英才”蒋筑英

■本报见习记者 韩扬眉

1982年7月末的一天，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农业技术中心(时称“黑龙江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宣传干事宋世锦正在所里搜集整理蒋筑英的事迹材料，突然接到《中国科学报》(时称《科学时报》)吉林记者站站长高景泰打来的电话：“世锦，报社对蒋筑英的事迹很关注，总编让我们马上去北京，我已给你请了假。”

一个多月前的6月15日下午，中科院院长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筑英在出差成都的过程中，因长期过度劳累病逝，年仅44岁。

蒋筑英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被评价为“中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蒋筑英的英年早逝，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重视。

7月31日，一夜风沙，宋世锦与高景泰到了报社，即刻向报社专副主编朱世和汇报了蒋筑英的简要情况。

朱世和听后，当即安排他们两人着手准备蒋筑英的报道稿件，并提出“要写通讯，一定要写好，5天后交稿”的明确要求。为便于两人安心写稿，报社专门在地坛门中直招待所为他们安排了房间。

“我们闭门谢客，床上摆满了材料，边熟悉边整理，边构思文章结构，边仔细推敲斟酌”，宋世锦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经过两人的讨论商议，最终将标题拟为“献身祖国光学事业的忠诚战士”。宋世锦对蒋筑英的情况更为熟悉一些，便自告奋

勇写作第一篇，高景泰加润色。第三天，稿件顺利完成，提交主编审阅。

1982年9月9日，《中国科学报》2版、3版整版刊登了《献身祖国光学事业的忠诚战士——记优秀中年科学家蒋筑英》的报道，这是当时国内首家刊发由本报记者独家采写的有关蒋筑英事迹的长篇通讯。

报道既出，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更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与批示。《长春日报》、《吉林日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也相继刊发了蒋筑英事迹的长篇通讯。

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刘敬之亲自到光机所作出指示：“追认蒋筑英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授省特等劳动模范。”

与此同时，光机所、长春分院、中科院和吉林省委先后发出了向蒋筑英学习的决定，吉林省革命博物馆举办了蒋筑英的事迹展览，光机所组成了蒋筑英事迹巡回报告团，数十万人聆听报告。

聂荣臻、方毅、胡乔木等领导同志先后题词或发表文章，呼吁各级部门要彻底肃清“左”的影响，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生活上切实关心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吉林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合作在光机所拍摄故事纪录片《蒋筑英》，宋世锦参与了影片的制作，“把蒋筑英的形象搬上银幕，把宣传蒋筑英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今年是蒋筑英离开后的第36个年头，在熟悉他的人看来，时光没有模糊掉这位昔日好友的形象，反而更加清晰。

■本报记者 丁佳

和很多科学家一样，南仁东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直到他去世后，公众才慢慢知道了这位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原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的一些事情。

幸运的是，2016年初，我与南仁东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是春节前夕，中科院的领导去国家天文台的办公室里探望老先生。

他的脸色很白，这与他常年在贵州施工现场工作的形象并不符合；而他一开口说话，沙哑的嗓音就更让人感到意外了。几分钟后我才知道，在前一年的4月，他被诊断出肺癌，已经接受过手术了。

领导前脚走，后脚台里的工作人员就打电话来了。“南老师嘱咐，不要把他得病的事写到新闻里。”

那是我唯一、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南仁东。彼时南仁东穿着黑毛衣，手喜欢抄着老兜，颇有几分潇洒，不像是个70多岁的人，更不像是得了绝症的人。

我没想到在一年多后，我竟会以一种追忆的方式去记录他。

2017年9月，南仁东去世后，全国主流媒体开始大范围报道他的先进事迹，全国科技界也迅速掀起了一股学习南仁东精神的热潮。

典型人物“高大全”式的新闻报道，我们已经看得、写得太多。交出一篇中规中矩的典型人物报道，对一个有些许经验的记者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那究竟是不是家人、朋友、学生、同事眼中的南仁东？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人的一生，难道不应当被人们所铭记吗？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刻意避开了对南仁东生平、功绩的罗列，而是去倾听他身边人讲述他们记忆中的南仁东。我渐渐发现，每个人心里的南仁东都是不一样的。他更像是一个浪子、一个老顽童，甚至是时髦分子，他的耿直、幽默和童真，与身上所背负的国之重器总工程师的头衔大相径庭。

2017年9月28日，《睁开“天眼”记住了“老南”》一文在《中国科学报》上刊登。这篇文章忠实记录了人们与南仁东交往的点滴，受访者也表达了他们的遗憾。

这篇文章并没有将南仁东塑造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可是通篇的“鸡毛蒜皮”和“烟火气”，却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朋友圈中许多科技界人士“含泪转发”，各大媒体也竞相转载。

2017年11月，南仁东被中宣部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在“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的录制现场，向来低调的南夫人发来一条短信——“我的先生南仁东一定不曾奢望会得到这样一份至高的荣誉称号。他就是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普通一员，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他未曾有过任何豪言壮语，宏图大志，他只是恪尽职守，终其一生完成了他应该完成的那一份工作……他就是您的邻居、朋友或同事。他身体力行的不过是个伟大时代赋予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

看到这条短信，我的心里无比欣慰，这条短信真正道出了我们的心声。这正是60年来，《中国科学报》矢志不渝要为社会大众呈现的当代科技工作者形象啊！

专家点评

完善制度保障 回归科学本身

■张黎(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技术史系教授)

“文革”十年，国家大部分科学研究处在停滞状态。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技界普遍认为科学研究的新时代到来了。

随着社会环境开放和思想解放，人们渴望了解世界，也看到了刚刚开放的中国与国外的巨大差距。那个时代的科学精神体现于一种朝气蓬勃、积极热情的科研态度，人们有理想有追求，科学家们迫切地想把耽误和损失的时间找回来。

改革开放40年来，物质条件、科研环境的变化翻天覆地，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包括科技界在内的整体社会氛围是浮躁、追求物欲的，这实际上不利于科学研究。

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内涵是求真、理性、质疑和务实，这是科技工

作者要坚守的科学价值观和原则。当然，科学研究需要有情怀，即对知识和科学本真的追求。

精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还不足以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相应的物质生活，这种情况下，简单地只用情怀要求他们，是不公平、不可持续的。

当下更重要的是要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建立一套有利于科研创新的奖励、评价、晋升等制度。科技体制改革已经30多年了，当时是为满足国家经济发展需求，但制度不够完善，职称、评奖等与利益挂钩，资本推动致使科研工作急功近利。当下，在强调科学研究应用价值的同时，还要鼓励回归科学本身，回归对自然和知识本身的好奇和探索。

专家点评

22年，只为一事来

■严俊(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长、FAST工程经理)

南仁东是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FAST)的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FAST是他近22年的全部事业。

22年来，南仁东带领大家利用贵州天然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建造了世界第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实现了大天区面积、高精度的天文观测。FAST的落成，让中国的射电天文事业从落后变成超前。

创新的左手是希望，右手是痛苦。FAST担负着研究日地环境、搜寻地外文明，以及满足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需求等重任，在建设过程中，团队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巨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鞭策着南仁东，他带领大家

创新路上走了22年，最终满载而归。

FAST工程实现了三项自主创新。望远镜建设利用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优良台址得以突破百米级限。团队自主发明了主动变形反射面，让“天眼”能够灵活主动地观察宇宙。科研人员自主研发出轻型钢索拖动机制，以牵引望远镜的“眼球”精确捕捉天文信息，将万吨平台降至几十吨。

我们应该感谢南仁东，他20多年就做了一件事，不为名，不为利，帮助中国实现了大射电望远镜的梦想，给了我们这代天文人圆梦的机会，把我们这些后来人引上了深入星辰大海的道路。

征程虽远，但路就在脚下！